

思想肖像

# 曾被遗忘的教育家

## ——缅怀比较教育先驱朱利安

王晓辉

比较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研究,寻求最利于人的发展的教育。比较教育的研究应当为完善教育科学提供新的方法。

今年是比较教育学科诞生200周年。1817年,法国教育家朱利安发表《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一书,由此,教育界将这一年作为比较教育学科诞生之年,朱利安也成为公认的“比较教育之父”。

### 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比较教育之父”

只有教育才能对人类的再生,对社会的改善,对国家的真正文明和繁荣,产生持久的和根本的影响。

朱利安1775年3月10日生于巴黎,1848年逝世。小朱利安在4岁时便对读书产生了极大兴趣,4岁零8个月就能给父亲写信。朱利安10岁时,父母将其送至巴黎的纳瓦尔中学,他从此开始与父母长时间地频繁通信交流,其中更多的是父母对他的谆谆教诲。

在巴黎期间,小朱利安受到革命的熏陶,成了雅各宾俱乐部最年轻的成员。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当天晚上,他就去散发自己书写的传单:摧毁巴士底狱尚不足道,需要推翻王冠!当时他才14岁。1792年,在孔多塞的授意下,朱利安作为学生外交官被派往伦敦。同年,他从伦敦返回,又被任命为比利牛斯军的战争督察员。1793年,朱利安被召回巴黎,受公安委员会派遣,任西部的各省代表。1794年4月18日,他又被任命为公共教育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公共教育部)成员,位居部长级,时年19岁。如此年轻且居高位,实属罕见。也许是擢升太快,也许是政治风云莫测,随着罗伯斯庇尔倒台,朱利安也于1794年8月10日被关进监狱,历时14个月。

朱利安出狱后,曾参加了意大利和埃及的战役,并在军界担任一些职务。但是,政治和军事工作都未能给朱利安带来希望。革命的挫折,促使朱利安对教育格外关注,他认为,只有教育才能对人类的再生,对社会的改善,对国家的真正文明和繁荣,产生持久的和根本的影响。

1819年,朱利安创立了《百科全书杂志》,将视角投向人类精神财富的各个领域。至1833年,该杂志完成了约300个词条,以每期600页、每年4期共2400页的超大容量向世人展示了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朱利安在此项伟大工程中,也由一个雅各宾主义者转变为国际主义者。

1817年,朱利安《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的著作出版。这部总共56页的小册

先见之思

书本就是一块“敲门砖”,以此描述书本的价值,甚为恰当

# 把学生领到自己心智的门口

卢立建

没有人能对你有所启示,除了在你知识的晨光中,那自己早已醒的。这句先知的吟咏,出自纪伯伦的《先知》。由此,这位黎巴嫩诗人开启了他教学思想的闸门。

那教师呢?教师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接下去就是,如果他真有智慧,他不会令你踏进他的智慧之堂,而是领你去你自己心智的门口。在纪伯伦看来,一位有智慧的老师应把学生领到学生自己的心智门口,给学生一把开启自身智慧的钥匙。许多类

似的解说,几乎都可以看作对这一智慧性思想的注解。例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有言:一个拙劣的教师把真理送到人面前,一个优秀的教师教人寻找真理。

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谈自由、爱情、孩子,主题很多,其中有一篇专谈教学,值得每位有追求的教育工作者乃至每位家长聆听。诗人的教育思想,萦绕在他的整个心灵中。到了《沙与沫》那里,诗人对所有人,但似乎更是对学生倾吐着:你如果

真的睁开眼睛,你会在一切形象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你如果真的竖起耳听,你会在一切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声音。

在纪伯伦的人生履历表上,没有教师这一经历,但令人惊叹的恰恰是,他对教育精髓与本质的深刻捕捉与领悟。他既是诗人,也是哲人。哲人与哲人往往心有灵犀,故而气息相通,思想相近。德国哲学家康德曾为西方近代教育树起一座丰碑,其《论教育学》中的思想与纪伯伦的智慧不期而遇,交相辉

映:理性知识不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而是从里面获得的。教育往往离不开教科书,但应如何看待教科书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纪伯伦关于教育的智慧,让我联想到日本山本玄禅禅师的话: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我想,书本就是一块敲门砖,以此描述书本的价值,甚为恰当。

在时下专谈教育的著作中,纪伯伦关于教育智慧的表达,直

通过一种与自己努力相协调的个人努力的联合,朝向同一目标,实现需要毕生精力去完成,并要延续几个世纪的工作。

在萌发比较教育思想的同时,朱利安的国际主义思想得以升华。他认为,即使在包容性极强的瑞士,各个州自治,总会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排他性,通过比较,不仅能够带来教育的部分改善,而且可以获得更普遍的结果和更高的重要性。可以产生彼此之间相互借鉴的思想,可以由州的精神,代之以瑞士民族精神。之后,他宣称同样思想可以用于欧洲大家庭。

不过,朱利安总是对所谓开明君主心存幻想,希望其比较教育计划能够得到某些权威人士或开明君主的赞赏与支持。然而,事与愿违,其宏伟计划终成一纸空文。

### 为了永久的纪念

用大量时间教导儿童,成功地发展他们的各种能力,感动他们的灵魂,使他们获得体力、道德和智慧的由其属性所允许的最大发展,使他们成就个性。

其实,朱利安的名字并未被完全遗忘,而是时不时地被人提起。如在1878年法国创建教育学院和在1889年教育博物馆落成时,人们都缅怀朱利安于1817年所创建的师范教育学院;1896年巴黎大学首次开设教育学课程时,有人又称朱利安为“被遗忘的教育家”。

今天,我们纪念他,并不是仅仅肯定他“比较教育之父”的历史地位,更是为了推动比较教育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界便有“比较教育”和“比较教育学”不同之说。而在朱利安看来,教育自客观事物起,是用事实说话,比较教育则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教育事实之比较。由实践而理论,也许是理解比较教育的一把钥匙。

朱利安的教育理想,多少带有卢梭的影响,主张用大量时间教导儿童,成功地发展他们的各种能力,感动他们的灵魂,使他们获得体力、道德和智慧的由其属性所允许的最大发展,使他们成就个性。尽管这种理想在迄今为止的任何社会都是无法实现的,但至少我们要追求教育的崇高,教育应当培育统一的、彼此宽容的社会道德的萌芽,而不是激发仇恨与破坏的狂热、骚乱与纷杂的欲望、销蚀个性的郁闷,以及所有毁坏我们社会的动乱因素。

朱利安还抨击当时那种混灭人性的教育,感叹道:如此教育出来的人们,当他们自身从未和谐相处时,如何能避免与其同类进行战争!在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至今局部战乱不已,恐怖主义抬头,社会暴戾之气弥漫之际,我们确实应当思考,人类如何实施更好的教育,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我们的后代。也许,这就是朱利安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几勺思想

## 面向未来的教育 如何定位教师角色与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世界级管理学家彼得·圣吉等在《比较教育研究》2017年第二期刊发《面向未来的教育如何定位教师角色与价值》一文。顾明远与彼得·圣吉凝聚东西方智慧的再次跨界对话。

教师的角色与价值是什么?顾明远提出,在传统教育里,教师是知识的载体和权威。但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知识,师生关系发生了很大转变。有些人因此认为教师可以下岗了,但他认为教师不会消亡,因为人们依旧需要教师引路。教师要成为引路人,教师既是一个教育环境的设计者,也是指导学生获取有用信息的指导者,又是一个帮学生克服困难的帮助者,此外,还是和学生共同学习的伙伴。彼得·圣吉也不约而同地提出,教师是引路人,这一观点,并且认为,教师要更好地教学,就要认识到,教学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更好地学习以及提升学习者自我学习的能力,也就是成长、进步的能力。传统的教育系统往往强调更好的教学,而实际上我们终极的目的是学习者的成长。对于教师来说,可以有一个普遍

的标准,希望我们的学生具备一些共同的素养,达成一些共同的目标,但不应通过标准化的流程让他们说一样的话,想一样的事,变成一个样子。教师需要一个标准,但更要顾及每个学生的特质性,而这需要教师在每一名学生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教师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顾明远认为,面对未来,教师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想想自己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是不是有好处。他提出四个教育信条: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师育人在于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相应地,师范教育也需要改革,要接地气,多联系实践。彼得·圣吉认为,有些教师在职业生涯中之所以能够不断精进,往往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伴学习网络。那些能够持续创新的学校往往存在着正式或非正式的教师合作网络,而这在很多时候取决于校长能否创建这种反思空间和氛围,让教师们去合作、对话。学校应当成为一个我们共同改善我们处世界家园。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数学、科学、阅读、写作这些课程,而是要让学生在真正有意义的和感兴趣的场景中去学习这些内容。

##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 用了哪些研究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石中英教授在《教育学报》2017年第一期刊发《杜威教育哲学论述的方法》一文指出,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使用的方法有现象学的方法、发生学的方法、概念分析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和反省思维的方法,而且每一种方法的使用都带有鲜明的杜威特有的实验主义或工具主义色彩。

相较于符号化的间接经验的遥远性、无生气性和冷淡性,杜威强调了直接经验的紧迫性、温暖性和亲切性。杜威对于直接经验的这种把握,充满了现象学中浓郁的人文气息。直接经验在这里不再是一种表达感性认识结果的认识或知识论范畴,而是一种描述人们与世界打交道过程中所产生的原初体验的存在论范畴。直接经验甚至也不是与间接经验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是人类的所有经验之母。现象学的方法帮助杜威摆脱了传统哲学二元论的纠缠,确立了有意识的行动(或经验)在其教育哲学论述中的本体论地位。

杜威在展开自己的教育哲学论述时,喜欢从一些日常的、简单的事件分析开始,举一些小例子,或者讲一个小故事,然后对这些例子或故事进行合情合理的分析,并展望例子或故事中的行为为进一步发展的情形,逐渐显示出当事人行为的结构以及影响行为的复杂因素,从而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杜威使用的这种论述方法是典型的“发生学”的方法,这方法显示了杜威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关注到了各种事物的生成性、连续性和情境

性,使得杜威的教育哲学论述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最经常使用的是概念分析的方法。从概念分析的类型来看,他交替、综合使用了词源分析、日常语言分析、隐喻分析等各种分析类型。这使杜威逃脱了传统概念意义与用法的陷阱,并基于自己的实用主义立场赋予许多概念以崭新的意义。

辩证的方法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一些成对的范畴关系及其变化来讨论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问题的产生、变化、联系等,最后得到对该问题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认识。杜威在整个哲学和教育哲学的论述过程中,也经常使用辩证的方法。不过,杜威对辩证方法的运用迥异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对许多概念关系的讨论不再囿于抽象的概念世界,而是深入到概念所指涉的行为及诱发这种行为的社会环境层面。

反省思维的方法是杜威的独创,因此也有人将其命名为“杜威方法”。杜威反省思维的方法的明显特征在于,思维或认识既非从已有的观念开始,也非从确定无疑的命题开始,而是从行为情境中的问题或困惑开始,经由试验性探究的渠道,达到对假说性结论的检验,从而有益于未来的行动。因此,反省思维的方法既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也是一种哲学的方法,更是一种时间的方法,同时具有科学向度、哲学向度和实践向度。它消弭了科学与哲学的边界、理论与实践的隔阂、知识与行为的对立,形成了杜威哲学的独特风格。

## 如何培育儿童的权利意识和公民行为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学院程丹丹、葛新斌在《外国教育研究》2017年第一期刊发《加拿大儿童权利课程述评》一文提出,面对公民教育的低效,在国际社会呼吁出台儿童权利保障政策、国内公民教育现实需要的双重牵引下,在儿童权利理论的发展推动下,加拿大儿童权利课程得以创生。

该课程以培育儿童的权利意识和公民行为为主要目的,现已形成包含先导课程和核心课程在内的完整课程体系。就八年级的课程框架来说,儿童权利课程的设计包含了近景和远景两重目标体系,通过儿童权利课程的实施,促使儿童在情感、态度和行动上逐次发生改变,进而实现保护儿童权利、推进世界和平民主进程的远景目标。核心课程内容包括基本需要、人人平等、环境与健康等8个主题,体现出明显

的以儿童为主体的特征。课程实施中主要采用教学活化方式,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采用内容情境化方式,以强化课程实施效果;采用学习小组化方式,以促成同伴合作关系;采用工具多样化方式,以助力学生对权利概念的掌握。这一课程为我国的儿童权利教育提供了很多启示:践行儿童主体的教育理念,这是建立儿童权利认知、培养儿童权利情感和形成儿童权利行为的基本点和生命线。汲取加拿大儿童权利课程的优点,结合我国实际,给予儿童更多有关自身权利保护的指导与帮助,是当前我国儿童权利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

同时,重视儿童公民身份的培育,从而切实将加拿大儿童权利课程的有益成分吸纳进我国现有的儿童权利教育之中,建立起本土化的儿童权利课程体系。(王杰 辑)